

先天下之憂： 論何國忠「學院派散文」的憂患意識

紀學玲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前 言

何國忠（1963-）是馬華文壇少數學而優則仕的學者。他於1984年入讀馬大中文系後便投身學生運動、撰寫社論，同時進行文學創作，大學時代即在馬華文壇嶄露頭角。他與葉寧（1959-）、瘦子（1955-）、潘碧華（1965-）等大專校園作家的散文在1980-1990年代馬華散文創作中曾各領一時風騷。何國忠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完成學士與碩士學位，後取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學位，曾任馬來亞大學講師、副教授、東亞研究系主任及中國研究所首任所長。2008年，他毅然從政，曾官拜高等教育部第一副部長。隨後雖漸淡出政壇，但一直活躍於學術與寫作圈子。身兼文人、學者與政治人物的多重身分，使他和他的作品

對社會現實與文化傳承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其創作與思想也深刻體現了馬來西亞華裔知識分子的精神軌跡。

作為 1980 年代馬華校園散文學院派的重要奠基者，何國忠以深沉獨特的憂患意識書寫時代，與古今憂患傳統一脈相承而又別具一格。他的校園散文三部曲《班荇谷燈影》（1989）、《塔裡塔外》（1995）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皆創作於其就讀和執教馬來亞大學期間。這些作品以知識分子的視野和理性思辨的筆觸，呈現了 1980-1990 年代馬來西亞社會的現實圖景，折射出馬來西亞華裔族群所面臨的內憂外患，也深刻體現了他作為馬華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對社會苦難的敏銳感知、對族群前途的憂忡，逐步轉向對人文精神與文化價值的終極關懷。這種意識既承襲了傳統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情懷，更在馬來西亞多元文化語境下生長出對人文價值的超越性關懷。這種時代擔當，使他的散文奠定了學院派校園散文在馬華文學史上的地位，構築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散文書寫的獨特風景。

本文以「憂患意識」為綱領，通過對上述三部散文的文本細讀與歷時性考察，分析何國忠憂患書寫的三個維度——「感時憂國」的公共介入、「感物吟志」的個體省思、「人間情懷」的文化超越，探討其如何將對現實困境的敏銳感受轉化為對人文精神的深層關懷，從而實現「先天下之憂」傳統精神在當代語境下的實踐，並勾勒其兼具傳統文人與現代學者的性格特質。相較於既有研究多將何國忠散文概括為「家國憂思」，本文更關注其憂患書寫如何由「感時憂國」進一步展開為「感物吟志」與「人間情

懷」的多重結構。

一、憂患書寫的開端：何國忠與學院派散文的奠基

（一）校園散文的興起與轉型

1980 年代初，馬來西亞高校興起了一股校園文學熱潮，一批以馬來亞大學和理科大學為代表的大學生寫手嶄露頭角。他們組建文學社團、出版刊物、創辦文學獎項，校園文學創作蓬勃發展，題材多樣，其中尤以散文創作最為引人注目。在那個年代，馬來西亞的大學屈指可數，能考入大學的學生皆為出類拔萃的「天子驕子」。這些學子用以抒情紀事的散文，在馬華文學史上被定位為「校園散文」^①。葉寧的《飛躍馬大校園》（1982）開啟了校園散文的序幕，瘦子的《大學生手記》（1983 年）亦是這一潮流的早期代表，他們以或浪漫唯美或幽默活潑的手法構建了令人嚮往的「馬大神話」。陳大為將這類散文定義為「校園生活散文」^②，其特點在於輕鬆易讀、富有生活情趣，深受當時

^① 鍾怡雯：〈馬華校園散文的文學史意義〉，《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景》，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6 年，頁 62-97；陳大為：〈校園散文的生產語境及其譜系之完成（1979-1994）〉，《馬華散文史縱論（1957-2007）》，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9 年，頁 185-222；黃錦樹：〈在馬哈迪時代抒情〉，《馬華文學與文化讀本》，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22 年，頁 133。

^② 陳大為：〈校園散文的生產語境及其譜系之完成（1979-1994）〉，《馬

讀者歡迎。繼葉寧、瘦子之後，「讀中文系的小子」何國忠亦創作了不少校園作品，然而其散文風格卻與前輩的輕鬆敘事截然不同。

何國忠的大學時代屬大馬華社的多事之秋。他的校園散文三部曲皆出版於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 1925-）第一次任相的「馬哈迪時代」（1982-2003）。馬哈迪的施政深刻影響了華裔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領域的發展。自 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族裔矛盾始終暗流湧動，其中華裔族群對語言、教育和文化自主性的追求成為爭議焦點。1980-1990 年代，馬來西亞自農業經濟向工業化轉型，中產階級崛起，然而，政治領域卻仍被種族問題的陰影籠罩。馬哈迪延續前任的「新經濟政策」，通過固打制強勢扶持土著，在企業所有權和大學錄取等方面對華裔族群形成壓制。此外，華文招牌、華小高職不諳中文事件，「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等政策偏差，以及對華教行政的頻繁干預，進一步加劇華裔族群的邊緣化危機。華社面臨的多重結構性困境讓身處象牙塔的華裔學子亦無法置身事外，深受這一氛圍感染。作為中文系學生，在這一風雨飄搖的年代，何國忠顯然無法如葉寧或瘦子那樣以輕鬆愜意的筆調構築象牙塔內的烏托邦。他的目光透過校園的圍牆，投射更廣闊的社會天地，聚焦於國家時局、族群命運與文化思考。他的散文敘事中處處可見這一代華裔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對潛在危機的警覺以及

捨我其誰的擔當。作為懷抱理想、肩負社會責任和文化使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何國忠無法對族群的前途和文化的命運無動於衷，他的校園散文自然而然地籠罩著沉鬱深沉的憂患基調。

（二）憂患意識與先天下之憂的時代內涵

徐復觀在《中國人性論史》（1969）中指出：「憂患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① 這一觀點強調了憂患意識與責任感、自覺意識的內在關聯。換言之，憂患意識並非單純情感上的憂慮或悲觀情緒，而是一種對潛在危機的自覺感知與擔當，以及敏銳洞察和前瞻性思考衍生而來的「先天下之憂」^②。何國忠深受華文教育與中華文化薰陶，顯然繼承了這一精神薪火。但他並非只是因襲前人理念，而是結合身處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現實，將傳統的憂患精神轉化出新的時代內涵，融入 1980 年代華裔知識分子的行動與思考。他既繼承了傳統文人的經世情懷，又受社會現實刺激而展現出多重使命意識：既要守護族群權益，也要在學術與人文精神層面追求更高的價值理想。這種意識不僅體現在家國命運與華裔困

^①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19。

^② 「先天下之憂」一語源自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歷代文人素以天下為己任，關注社稷安危與黎民疾苦，這種先憂後樂的情懷成為傳統華人知識分子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境的嘆惋，更內含一種理想主義的敏感——在作品裡屢次流露出對人文理想的渴求，對學術文化使命的堅守，這也使得他的散文不至於陷入單純的悲情，而是兼具理性與克制。一方面，他在作品中秉承了知識分子關注現實、憂國憂民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以理性克制的寫作策略來表達情懷，將深沉的憂思融匯進冷靜客觀的敘述之中，而非簡單的情緒宣洩。這種「不渲不染」的理性筆調，使其憂患書寫別具一格：既有力度和深度，又不失節制和從容。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校園散文的主題層次從單純的生活抒寫提升到關照時代、反思文化的高度。

（三）學院派散文的憂患表達與文學史定位

校園散文三部曲貫穿了他何國忠在馬來亞大學的求學與任教生涯，是其憂思逐步深化的重要載體。《班荇谷燈影》（1989）以青年學子「不平則鳴」精神開啟了「學院派」文化書寫的角度。鍾怡雯、陳大為認為該書是「校園散文從輕轉重的里程碑」^①，標誌著散文從生活記錄轉向知識分子表達憂懷的新境域。《塔裡塔外》則將視野從校園擴展到社會文化批評，強調理性批判與文化深度並重，漸次奠定此一校園散文路向的思想基調。至《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其書寫以懷人散文探討跨域文化人的生命軌跡與精神困境，凸顯對人文價值的深切關注，並展現對社會與歷史

^① 鍾怡雯、陳大為：《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2007 Vol.2》，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7年，頁137。

更寬廣的關注面向。在三部曲的互文對照下，我們可看見從公共介入到個體省思，最終昇華為更宏觀的文化超越，完整勾勒出何國忠從青年學子到人文學者的心靈成長史。學者鄭明嫻指出，《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可被視為「典型的學者散文」^①；陳大為更認為該書實為「校園散文最成熟的演進類型之一」^②。學院派散文與學者散文在現代散文研究中概念往往交錯。例如香港沙田派散文既被稱為「學院派作家散文」，也常被視作「學者散文」。兩者皆為人文知識分子創作、具有學者專業個性、文化立場與話語方式的散文作品^③。本文將兩者視為同一概念，探討時交互並用，並以陳大為對「學院派校園散文」的界定為參照，以突顯何國忠散文既脫胎自馬華文學史上具有時代意義的校園散文風潮，又因學術特質而與一般此類校園書寫有所區別。

在校園散文的發展歷程中，何國忠以濃重的憂思將散文創作從記錄生活或自娛娛人的範圍提升到關照現實、介入時代的層次。他雖身處校園，卻不斷放眼社會，與那個時代同頻共振。學院派由其筆下的校園散文三部曲掀開帷幕，奠定基礎，趨向成熟。其中，散文中的憂患意識，被討論得最多的往往是他的「家國憂思」；在馬來西亞華文文學語境中，學者也多以「感時憂國」作為 1980-1990 年代這一路向書寫中憂患特質的註腳。筆者

① 鄭明嫻：〈論何國忠散文〉，《香港文學》，2016 年 3 月，第 375 期。

② 陳大為：〈校園散文的生產語境及其譜系之完成（1979-1994）〉，《馬華散文史縱論（1957-2007）》，頁 185-222。

③ 董正宇：〈也說「學者散文」〉，《理論與創作》，2001 年，第 1 期。

卻以為，何國忠校園散文的憂患內涵從對族群困境出發，逐步擴展到文化續存和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超越了傳統的「家國憂思」，展現了更廣泛的人文視野與文化共情。

二、憂患意識的三重維度：從家國到人文

「憂患意識」不僅是一種情感的流露，更是一種深沉的思想表達，體現了何國忠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這種意識根植於他對馬來西亞華社現實困境的敏銳感知，貫穿於他對個體精神追求的反思，最終昇華為對人性與文化價值的終極關懷。既有對何國忠憂患意識的研究多聚焦於「家國憂思」，強調其在馬來西亞華社抗爭語境下的現實介入。然而，若僅以「感時憂國」概括其散文精神，則可能遮蔽了其憂患書寫更深層次的複雜性與超越性。通過對何國忠校園散文三部曲《班荇谷燈影》《塔裡塔外》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的細讀，不難發現其憂患意識的三重維度：關注社會現實的「感時憂國」、反思個體志向的「感物吟志」以及超越族群敘事的「人間情懷」。這三個維度由外而內、由淺入深，層層遞進，並且相互關聯，共同勾勒出其從青年學子到成熟學者的心靈成長軌跡，構築了其散文的思想內核，同時展現其從家國憂思到人文關懷的思想演進，這類知識分子散文既富有時代擔當，也體現出深刻的人文反思。換言之，何國忠不僅憂慮華社之「天下」，更著眼於當代知識分子如何傳承並實踐「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使命。本章以此為脈絡，通過文

本分析，揭示何國忠如何以散文為媒介，將對族群危機的憂慮轉化為對人文價值的終極追問。其憂患意識並非靜態的「抗爭工具」，而是動態的「思想實驗」——從對社會現實的冷峻剖析，到人文理想的孤獨堅守，最終昇華為對人類精神困境的普遍共情。這一過程既彰顯了何國忠作為傳統文人與現代學者的雙重特質，也為馬華文學提供了一條超越族群敘事的可能路徑。

（一）感時憂國：華社困境的鏡像書寫

在《班荇谷燈影》再版的〈十方版自序〉（1995）^①，何國忠這樣回顧自己的早期創作：

我摩挲故作，知道自己從前感情充沛，彷彿又有些憂患意識，有許多不滿，許多不自在，也有點理想，但思想和知識的體驗，還有許多可以成長的空間。^②

這一自述不僅是作者的自我意識的寫照，也折射了 1980 年代馬來西亞華裔知識分子的複雜情感與時代憂思。文學創作並非孤立的思想表達，其生成與社會現實及文化語境有著深刻的互動關聯。何國忠的散文亦然。他青年時期的憂懷深深根植於馬來西亞華社所面臨的時代困境。他的第一部校園散文《班荇谷燈影》記錄了他在馬來亞大學求學、任助教、做碩士研究期間的經歷與思

^① 《班荇谷燈影》是何國忠的第一部散文集，1989 年由澤吟書坊出版，後由十方出版社於 1995 年再版。

^② 何國忠：〈十方版自序〉，《班荇谷燈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 年，頁 5。

考。馬大位於班荅谷（Lembah Pantai），班荅谷的燈影投射出的正是他對現實社會的有感而發，蘊含年輕學子的理想與熱忱。

1980 年代馬來西亞在馬哈迪主政下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延續「新經濟政策」和固打制，旨在提升土著地位，卻對華裔族群在教育、經濟和文化領域的發展構成顯著制約，大學錄取名額的種族配額限制了華裔青年的升學機會，而對華文教育和文化的干預則加劇了族群的文化危機感。華社內憂外患交織，瀰漫著焦慮不安的情緒。處在馬大中文系的何國忠，自然對華社的現實有著更為敏銳的感受，他的作品正是記錄與反思這一時代華裔青年共同困境的重要文本。他在論文〈憂患意識中的文化情懷〉（1989），生動刻畫了當時華裔大學生在文化危機下的自覺與抗爭：

馬大中文系在 1970 年代末人數激增；國民大學華族學生從 1983 年開始每年都辦大型的中秋文娛晚會；而馬大、理大華文學會的文化活動層出不窮，特別是在 1980 年代文化危機感最強烈的時期，其凝聚力更是其他學會望塵莫及的。國內其他大學雖然不允許華文學會存在，但大學生卻能在所及的範圍內主辦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活動、出版刊物，不眠不休，這已經不是新鮮的事……。文化使命在大專學府可說是代表了這一代青年的「憂患意識」。^①

^① 何國忠：〈尋找自己的身分：憂患意識中的文化情懷〉，《馬來西亞華

大學校園雖被視為「象牙塔」，卻也無法脫離社會政治氛圍。外部政策壓力與現實挫折令人深感無力，也激發了大學生內在的文化使命感與憂慮情緒。〈時代的眼睛〉（1989）進一步揭示了這種普遍的心理狀態：

十多二十年來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節節敗退，華人的心理普遍上都存在著非常強烈的挫折感。大學生也看書讀報，對於外面的事不可能說是毫無知覺的。他們是社會的一分子，自然也很瞭解人民的生活，關心他們的希望和痛苦。我們常說大學是社會的縮影，這一句話一點都沒有錯。在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事，裡面幾乎都發生著。外面有行政偏差的事件，裡頭一樣不能倖免；外邊有種族極化的現象，裡頭照樣不能避開。因此華社中一切的不如意事，大學生是很能心領神會的。^①

透過校園這一社會的縮影，他清晰地捕捉到了華裔青年面對時代困境的焦慮與不安。〈時代的眼睛〉寫於何國忠在馬大的第四年，這時的他已從積極爭取成立馬大華文學會的熱血執委功成身退，更喜歡躲在圖書館裡進行思考和探索。華社處境窘迫，象牙塔裡的華裔學子也無法倖免於固打制、大專法令、行政偏差、種族兩極化等困境中，對華裔大學生的心理產生了巨大影響，而身

人：身分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研出版社，2002年，頁219-220。

^① 何國忠：〈時代的眼睛〉，《班荇谷燈影》，頁104-112。

處中文系的作者感受自然更加深刻。正如身在海外卻一直關注馬來西亞國情的學者黃錦樹所指，由於教育政策的影響，能擠進馬大窄門的華裔學子不僅是華社的天之驕子，更是處於文化衝突的最前線，因此誕生於這個年代的校園散文往往帶有「超額的憂患感。」^①

這種憂患感與社會責任感高度融合，作為一個有理想又富有文化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何國忠無法不對族群的未來與文化的命運感到憂慮。在同一篇散文中，他忍不住省思：「這一代的華裔大學生是否會成為將來族群中的眼睛呢？」他擔憂時局壓力可能導致大學生「在既急迫又束手無策的不健康心理下成長」^②，從而視野狹窄、思想貧乏。由此引發的，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與反省：大學生是否能成為族群的「眼睛」，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保持洞察與擔當？

在〈殘存記憶中的騰躍〉（1989）一文中，何國忠回憶了參與華文學會籌委會爭取成立華文學會到見證其成立的全過程，體現了個人與集體命運的交織：

在籌委會的生涯裡，所感受的快樂和憂傷，一萬字雖未言短，十萬字，甚至是百萬字又何能盡意？我的大學生活假如沒有華文學會籌委會的點綴，肯定是空白無味的一章。那兩年，讓我長大，在因循錯誤交織的華裔社會

^① 黃錦樹：〈在馬哈迪時代抒情〉，《馬華文學與文化讀本》，頁 133。

^② 何國忠：〈殘存記憶中的騰躍〉，《班荇谷燈影》，頁 33-42。

裡，肯定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①

這一平實卻帶有沉思意味的筆調，揭示了他對現實困境的冷靜反思和自我成長歷程。籌委會的工作佔據了他大學生涯頭兩年的大部分時間，雖然繁重且充滿不確定性，但他仍願意將個人成長與集體命運緊密聯繫。在華文學會被正式宣佈成立以前，籌委會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向大眾公佈，面對一波三折的官方審批過程，此前「狼來了」的經歷使早熟的學子們有了戒心，擔心「過早的興奮將會帶來長久的失望和傷感」^②，但他們也在辛勞與等待中獲得成長。華文學會在華裔大學生不屈不撓地抗爭了十二年之後，1986年底終於在馬大校長宣佈下正式成立：

當時許多學生都逃課趕往現場，這一回肯定是真的了。

沒有一個學生不百感交集，靜靜地想一想，心裡總還是有一絲絲的不甘心，為什麼要等十二年那麼久呢？……

在華文學會籌委會裡頭活動過的人，誰不曾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歷程？^③

族群與文化的權益一直是華社悲憤的因子，然而這段文字既無慷慨激昂的控訴，亦無沉溺式的感傷，何國忠摒棄悲情渲染，通過冷靜克制的敘述和反問，以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揭示華社爭取權益之路的艱辛，也暗含對未來的憂忡。緊接著，他筆鋒一轉，又

^① 何國忠：〈殘存記憶中的騰躍〉，《班荇谷燈影》，頁 33-42。

^② 何國忠：〈殘存記憶中的騰躍〉，《班荇谷燈影》，頁 33-42。

^③ 何國忠：〈殘存記憶中的騰躍〉，《班荇谷燈影》，頁 33-42。

以議論的方式剖析華社對大學生的忽視：

華裔社會人士一向來只關注大專學府學額的爭取，對於大學裡所發生的一切事物，從來不曾主動關心過，總以為能進大學的華裔子弟都是天子驕子。將他們送到裡面，他們就一個個心滿意足了。殊不知大學對社會思潮有著帶頭的作用，是培養國家民族領袖的最佳場所。而華文學會的成立，更能在訓練華裔社會領袖方面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①

除了批判華社人士偽善面孔背後的短視與功利，他也對當時一些華裔領袖的無作為提出長嘆式省思：

華裔所面對的難題堆積如山，華裔頭頭缺乏他們應有的權威性……和這些人交談以後，當然更能進一步知道華裔地位低落的由來，以及華族難題發生的必然性。……總括一句，官官不是不為，事實是有心無力。^②

文章不僅著力揭露外在政治環境的壓制，也回望華社內在種種弊端和痼疾。華社問題積累已久，固然是有國家政策偏差而使華裔權益受侵，遭受種種不公平的緣故，可問題一直常年懸而未決，未嘗與族人目光短淺，思想狹隘不無關係。這種對華社內憂的審視，在《班荇谷燈影》的〈疏忽了的關心〉（1989）、〈團結口號中的沉思〉（1989）等篇目中亦多有體現。他認為，華社未能

^① 何國忠：〈殘存記憶中的騰躍〉，《班荇谷燈影》，頁 33-42。

^② 何國忠：〈殘存記憶中的騰躍〉，《班荇谷燈影》，頁 33-42。

看清問題的本質，往往只會因一時口號和表面熱情而忽略了長期的思考與持續努力，結果便在惡性循環裡深陷難以自拔的尷尬局面。他曾經用一連串詰問，揭露華社對大學生困境的漠視：

華裔社會的觀念是：能將他們送入大學，他們應該已心滿意足，是不應該有什麼奢求的了。因此華裔大學生的心態如何？他們在大學如何度日？大學的制度如何？在種族的比例有差距而學生有種族兩極化的傾向時，他們如何自處？大專法令的內容是什麼？學生會又是怎麼樣的組織？為什麼當今許多政壇的頂尖領袖都是出自學生會？一大堆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探討，但是大部分的華裔社會人士都回答不出，事實上他們似乎也不想去回答。^①

他犀利地質問華裔社會人士何曾關心過學子如何自處？大專法令如何鉗制思想？這種批判既指向外部環境對人文教育的壓制，亦暗含對族群短視的痛心。他以理性筆調批判華社口號的空洞化：

我們一直被權益問題干擾了視線，結果許多迫切需要我們努力的事情都在無意中被疏忽掉了。事實上，如果連民族尊嚴也沒有的話，再多喊幾聲團結口號也是徒然。^②

當現實中的「權益」爭取不斷干擾華社的視線，真正需要反思和努力的文化、思想、教育等更根本的問題往往被忽略。華社缺乏對於大學制度的真正關注，也無力給予作為族群未來希望的大學

^① 何國忠：〈疏忽了的關心〉，《班荇谷燈影》，頁 50-52。

^② 何國忠：〈團結口號中的沉思〉，《班荇谷燈影》，頁 65-67。

生人文學術上的支持，終至讓年輕一代陷於「道遠而力微」的失落與疲憊。

華社的「外部困境」與「內部弊端」被散文一併納入筆下，進行多層次的批判與自省。他多次指出，當華社人士只把目光聚焦於「爭取更多學額」或表面功利，而忽視大學生的人文培養與學術環境時，就很難談及長遠的文化根基與民族尊嚴。這些文字以敏銳的觀察力和理性批判，勾勒出華社目光狹隘與偽善的沉痾，凸顯何國忠對族群未來的深沉憂慮。他認為，真正的憂患根源不僅在於外部壓迫，更在於內部對人文學術思想的忽視和精神層面的貧乏。

這種「感時憂國」不僅是直面社會現實的困頓，也隱含對內在反思、文化素養與精神格局的憂慮，對未來走向與文化理想的追問。

對華社問題的鏡像式書寫，不僅再現了馬華社會現實的深刻困境，彰顯了知識分子對族群未來的深沉憂慮與責任擔當，也是何國忠作為當代華裔知識分子呼應「先天下之憂」的直接實踐。然而，這種憂患意識並非停留於對社會現實的直接回應，而是逐步深入到對個體精神困境與人文價值的反思，從而構成他憂患書寫的另一層維度——「感物吟志」。

（二）感物吟志：理想主義者的精神困境

對於何國忠而言，憂患意識不僅體現在對家國大事的關注，也滲透在他個人志業的選擇與生命體驗之中。如果說「感時憂

國」主要聚焦華社公共層面的危機，那麼「感物吟志」則轉向個體精神世界的深層焦慮，進一步體現了其作為理想主義者與學者型散文家的自我期許與困境。此時的憂思，不再單純指向對族群命運的憂慮，也包含對自身學術道路、文化價值乃至傳統與現代衝突的持續反省。何國忠正是在這樣的內在張力中，從早期的家國敘事過渡到更具人文自省的寫作。在其散文中，多以平實卻飽含思辨的筆調勾勒出這一層精神矛盾——既不捨對社會的現實擔當，又困於個體學術與文化理想的掙扎，並逐漸內化為知識分子對自我身分和價值的思考。

何國忠立志很早。他很早就決心要修讀人文學科，且在高中時期就已決定了將來要走學術的路。他在代表作〈讀中文系的小子〉（1989）以第三人稱寫了這樣一段告白：

他景仰的人物絕大部分都是修讀人文學科的，而探討人性本質又是他最大的興趣，當初他是秉著興趣進入文學院，最後仍然以同樣的理由選擇中文系，他有一個信念，只要念得好，他一樣能揚眉吐氣！^①

他將自己「探討人性本質」的志趣發展為「修讀人文學科」的志向，並義無反顧地朝著「學術的路」勇往直前。然而，正因為這種近乎執拗的信念，讓他在這個對人文學科並不友善的功利社會，以及在自身族群處境並不樂觀的時代和政治環境中，無可避免地與憂患結下不解之緣，尤其是他修讀的還是肩負文化重擔卻

^① 何國忠：〈讀中文系的小子〉，《班荇谷燈影》，頁 26-32。

又被認為出路狹窄的中文系！他在〈讀中文系的小子〉細膩地剖析了自己作為中文系學生的心路歷程：既要承載華社對文化傳承的期待，又需直面經濟壓力與學術邊緣化的現實。這種狀態使其憂懷從族群層面轉向個體精神層面：作為一位承擔社會責任的文人學者，究竟如何平衡「人文理想」與「生存現實」？這也正是何國忠「感物吟志」的重要起點。

「感物吟志」典出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①意指文人觸景生情，以外物寄託志向情懷。「感物」不僅指對外部世界的敏銳感受，也往往蘊含對社會人生的移情與思辨；「吟志」則是抒發自身志向、抱負與道德情懷。何國忠承繼這一傳統文人寫作觀，卻又將其擴充到馬來西亞當代脈絡中。身處多元文化環境，中文系學生和華裔學者的身分，使他在日常所見所聞中激發出對民族文化與人文學術的強烈執著。然而，在工商掛帥的馬來西亞，念中文系、堅持做學術研究都是需要勇氣和毅力的。於是，那種價值觀和志向不被主流社會認同，持久沉重的憂患矛盾便時時在其感物吟志的散文創作中流露。

年輕的何國忠曾觀察到：「大半早熟又有理想的年輕人的成長過程都是在憂患、挫折、不滿、迷茫中交集而成。」^②他本身

^① 【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6。

^② 何國忠：〈論大學生的思想困境〉，《今我來思》，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3年，頁33。

就有著早熟又有理想的年輕人的敏感觸覺，所以他的憂患意識覺醒展現得極早。高中立下志願之後，因擔心應酬會耽擱學術，他很少主動結交新朋友。當時的他甚至以為孤獨更能激勵創作，所以為自己築起了一道牆。那時的他極崇拜胡適（1891-1962），為了學胡適的老成持重，他極力壓抑自己的個性。他在〈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1989）提到：

胡適的做人方式深深地影響了我，我甚至將他當作我人生的典範。胡適的老成持重是出了名的，為了學他，我只好壓抑自己的個性，不愛言笑，每天裝著老成持重成熟的樣子，做個不像大人的大人。^①

為了自己的志向和景仰的人物，他把自己原來「說話特別多，笑也特別多，整天蹦蹦跳跳，興起時還會哼幾首歌曲」^②的性子往老成持重壓抑，儘管後來他改變了這樣的想法，不再壓抑自己的性格，老成持重最後卻也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沉靜凝練的文風。綜觀何國忠的校園散文三部曲，只有發表於大學一年級的〈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的基調是愉悅而外放的。這篇散文抒寫了他接到大學錄取通知前，在某個小鎮當臨時教師的一段愉快的生活。正是這個令他懷念不已的小鎮改變了他想要變得孤單的想法。此文在談起自己的志向之時，尚能感受到其筆觸間一種調皮的自我調侃。然而，隨著大學生涯的開展，他的校園環境、他的志向、

^① 何國忠：〈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班荇谷燈影》，頁 12-18。

^② 何國忠：〈消逝了的似青山還在〉，《班荇谷燈影》，頁 12-18。

他的使命感讓他再也逃不開文化的承擔，自此以後，訴諸散文創作之中的多是「很多時候我們都無法展顏歡笑」^①那種化不開的憂患情懷。

同樣在馬大校園裡，何國忠的象牙塔沒有葉寧的豪爽瀟灑、神采飛揚，也沒有瘦子的活潑詼諧，因為他是柏楊口中「走路時，頭總是低低的」^②的中文系學生。儘管他選修中文系的決心是堅定的，當一再面對「不該問的問題」，或者被關心地詢問：「選修中文系時，家裡是否有人反對？」^③，他雖以「義無反顧」的姿態回應，卻無法波瀾不驚，因而散文中屢屢流露身分焦慮。「他自始至終都知道，文學院的錄取分數是各個學院最低的……而中文系又曾被人說是文學院中出路最狹窄的——」^④儘管習以為常，他還是常會忍不住去思考這些問題。他在文章中坦言，中文系學生往往比其他科系的學生更容易產生憂患心理，因為他們過早地承受了社會對他們的異樣眼光，以及對於未來的憂慮。而擁有典型傳統文人氣質和性情的何國忠對這一種意識更加敏感。社會的趨勢是注重工商輕人文，於是，在〈讀中文系的小子〉一文中，他情不自禁地兩次發出「讀中文系難道一定得和錢途掛鉤？」^⑤這樣的詰問。他在〈傳燈〉（1989）這樣寫道：

^① 何國忠：〈苦澀的歲月〉，《班荇谷燈影》，頁 62-64。

^② 何國忠：〈讀中文系的小子〉，《班荇谷燈影》，頁 26-32。

^③ 何國忠：〈讀中文系的小子〉，《班荇谷燈影》，頁 26-32。

^④ 何國忠：〈讀中文系的小子〉，《班荇谷燈影》，頁 26-32。

^⑤ 何國忠：〈讀中文系的小子〉，《班荇谷燈影》，頁 26-32。

在這裡讀過一點中文的人都清楚，似乎是讀越高的中文，就須要有越大的勇氣：要顧及出路，要顧及不會忽略國語和英語，要顧及自己的文化情懷不會摻雜有任何的政治意識。要想到許多文人徘徊在文化良知和現實之間那分複雜的心情，心裡就不能釋懷，更覺得這條路分外難行。^①

題名「傳燈」，既呼應傳統意義上薪火相傳的文化使命，也暗示了作者「燃燈自照」的精神需求。對「中文系的小子」而言，所肩負的也許不僅是華社的期待，更是對於自身獨立精神的勇敢持守。這樣一種微妙的學術之路，將讀者引向了作者內心的矛盾：要堅守學術文化傳燈，卻又時常感到力不從心；要完成時代賦予的責任，卻又陷於知識分子孤獨的精神困境。因此，他在〈校園書〉（1989）中坦承自己走人文道路走得「很累」，所以「這些年來我從來不曾刻意也不敢影響別人走我同樣的路……」^② 儘管如此，他依然堅守〈只緣身在此山中〉（1989）的信念：

我是屬於中文系的，我告訴自己。這幾年裡，我學到中學課堂裡闕如的古典和生命，追溯幾千年來人類的思維。不過我真正珍惜的，卻是從中領略到的一種關懷、一種愛、一種活力、一種良知，我默默地思索生命的意

^① 何國忠：〈傳燈〉，《班荇谷燈影》，頁 123-125。

^② 何國忠：〈校園書〉，《班荇谷燈影》，頁 174-176。

義。^①

從堅守中體悟出對文化、生命的關懷與熱愛，這是修讀人文科系者的一種精神擔當。可見，「感物吟志」之中所蘊含的，正是何國忠個人志業與情懷交織而成的憂慮——既有對自身理想難以實現的苦悶，也有對人文精神難以伸張的感喟。

隨著學識歷練的增長，何國忠的散文筆觸逐漸變得更加沉穩內省。比起《班荇谷燈影》時期「這個年齡充斥的是以天下為己任」^②的直訴憂懷、不平則鳴，《塔裡塔外》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從更成熟、冷靜的學院派，表達自己對學術的執著與身為學者的自省。《塔裡塔外》是一部「脫離了校園主題，跨足到文化現象批評層面的學院散文」。彼時已是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講師的何國忠，將其憂患視野從象牙塔內擴展到社會文化現象，並以「感物吟志，隨性而寫」的筆調，探討如何在校園與社會之間尋求自我定位。〈動與靜〉（1995）便清晰呈現這種心境：

九個月內連續參與籌辦兩個活動，在學者「應該甘於寂寞，應多研究寫作」的理念上，的確讓我覺得不安心，擔心誤了正業。但在感性上，偶爾的籌辦活動應是我生命中自然的過程，也許是身體中就存在著一些動的基因，又或者是現實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刺激。^③

^① 何國忠：〈只緣身在此山中〉，《班荇谷燈影》，頁 43-49。

^② 何國忠：〈苦澀的歲月〉，《班荇谷燈影》，頁 62-64。

^③ 何國忠：〈動與靜〉，《塔裡塔外》，頁 85-93。

在文中，他坦承了學者「應多研究寫作」的理性要求，與現實環境對其文化責任的呼喚之間的緊張：他想潛心治學，卻也無法完全排拒社會與文化事務。借用蘇東坡「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的詩意自勉，他努力於「虛靜治學」與「現實介入」之間探尋平衡，並期望「無須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尋找定位」的理想能夠實現。《文化人的感情世界》收錄了他擔任馬大東亞系主任期間發表的「懷人散文」，其中的〈鄭良樹老師的心事〉（2002）一文他也有同樣的自省：「我在學術界沒有什麼建樹，動的時間太多，靜的時間太少，不夠用功，實在愧對老師。」^①再次點出學術理想與現實事務衝突下的內在矛盾。

在「感物吟志」的維度，何國忠筆下聚焦的不再是族群或社會體制的不公，而是人文價值可能被忽略的憂忡。他多次提及中文系的人文學術與社會功利之間的張力，認為一旦放棄人文關懷，整個民族將面臨深層次的文化貧乏。由此，他的這種憂思自然地與傳統文人「士不可不弘毅」之氣質相貫通，也與當代知識分子講求的科學理性和獨立思考相結合。何國忠的散文，尤其在〈讀中文系的小子〉與〈傳燈〉這類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對於「為何而學」、「為何而寫」的追問。作為理想主義者，他心中有對社會與文化的無限期待；作為現實中的學者，他又深知環境之侷限和個人之渺小。兩種力量碰撞所產生的張力，正是「感物

^① 何國忠：〈鄭良樹老師的心事〉，《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年，頁143-148。

吟志」的精彩之處。

何國忠的「感物吟志」始終與「感時憂國」形成辯證互文：前者深化了後者的思想厚度，後者則為前者提供了現實支點。

當族群命運的集體焦慮與個體精神困境交織，這種內外並存的憂患正是其散文從社會介入到人文反思的關鍵路徑。何國忠的關懷視野逐漸從「華社之天下」拓展至「人文之天下」，最終完成對傳統「先天下之憂」的現代重構——知識分子的使命，不僅在於直面現實苦難，更需在文化傳承與人性關懷中尋找終極價值。

（三）人間情懷：文化超越的終極關懷

校園散文三部曲，尤其是《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展現了何國忠憂患意識從傳統的「感時憂國」與「感物吟志」向更深層次的「人間情懷」演進的過程。這一演進並非對前兩者的割裂，而是以文化共情為紐帶，將族群命運與個體困境融入更廣闊的人類文明視野。

關於何國忠散文此一關懷內涵的討論，鍾怡雯（2009）的「馬華文學的『浪漫』傳統」論述最受關注。她以「縱的上承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傳統，橫的切出時代脈動，進而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烏托邦」^①來對校園散文進行概括。鍾怡雯認為，何國忠

^① 鍾怡雯：〈馬華校園散文的文學史意義〉，《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9年，頁149-174。

看似「反浪漫」的「浪漫」書寫，是一種隱藏於淡定文字之下的「文化託命」與理想焦慮。鍾氏進一步指出，何國忠在作品中不書寫「經國濟世」之宏志，而著重「感情」與內心刻畫，可能是一種對比個人心境而進行的自我投射——作為一個文人，對社會改革的無能為力，或用以掩飾自己在政治社會中的無能為力。^①這一解讀，可能錯估了何國忠的創作意圖。若更深入檢視其文本，便會發現，他所關注的並不只是「政治社會中的有力或無力」，而是以學者姿態去挖掘文化人心靈深處的價值。他並非以「淡定」掩飾無力感，而是以更寬廣的人文與理性視域，探尋學者在現實政治之外的精神使命。他將對社會改革的關注轉化為對文化精神的深度凝望，並非掩飾或退避，而是知識分子重新定位自身使命的積極嘗試。他的文字不寫「經國濟世」的表面雄心，並不意味著放棄社會介入；恰恰是通過剖析文化人的靈魂與境遇，何國忠向讀者展現了理性與人性交融的「人間情懷」，超越了狹隘的族群敘事。

中國當代學人陳平原在〈學者的人間情懷〉（1993）中指出：學者以治學為第一天職，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現實政治論爭。學者如果選擇「議政」，是基於有情、不忍，基於「道德良心不能不開口，是一種「人間情懷」。他還強調，學者在社會生活中應保持「人間情懷」，即在專業研究之外，憑良知與道德

^① 鍾怡雯：〈馬華校園散文的文學史意義〉，《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頁 149-174。

對現實進行關注與反思^①。何國忠的散文創作正契合這一學者姿態，其憂患意識並非侷限於鍾怡雯所言的政治無力感，而是以感性與理性交融的方式，展現出對人性本質與文化傳承的深刻省察。何國忠在其寫作初期便明確分工，他在《塔裡塔外·後記》（1995）中提到，這階段的寫作分為三類：一類是安身立命的學術論文；一類是專欄的評論文字；還有一類是用以調節心情的散文創作。學術論文發揮其專業特長，評論文字針砭時弊體現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而散文創作則成為他保持「人間情懷」的載體。博士畢業後從英國回到馬來西亞，他以治學為主，報刊邀其撰寫時事與文化評論，他選擇以學者散文的形式，通過隨筆與閒聊的方式懷人抒懷，表達專業研究之外的另一種自我表達或關注現實的形式。他雖企盼名士風韻，卻往往因「有情」與「不忍」，無法做到「難得糊塗」，因而在散文中「入世痕跡處處」^②。陳蝶認為「何國忠如果在其政治性和知性強烈的文字中注入更多『感性』，不失為九十年代的星光。」^③事實上，何國忠卻恰恰是個極為感性的人，他從不諱言自己的「感情充沛」^④與「多情的細

^① 陳平原：〈學者的人間情懷〉，《讀書》，1993年，第5期，頁75-80。

^② 何國忠：〈後記〉，《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173。

^③ 陳蝶：〈細雨狂飆含笑過——回顧與展望馬華散文七十年〉，收入戴小華、柯金德編《馬華文學七十年的回顧與前瞻》，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1991年，頁177。

^④ 何國忠：〈十方版自序〉，《班荇谷燈影》，頁5。

胞」^①。他在〈感性與理性之間〉（1995）提到學術使他擺脫少年的彷徨，因專注寫論文，他的感性越來越少，但不引以為憾。不過，他接著又說「沒有感情寫不出好文章，學術和非學術文章都是如此，才識重要，學問重要，但也要有感情，讀來才有味道。」^②他在〈書事〉（1995）中表達了對「情見乎詞」的散文小品的喜愛，不喜歡「滿紙說教，喜歡言志，賣弄道德嘴臉」的文字，因為「沒什麼『人』味」^③——重「情」重「人」，從中不難窺見其「人間情懷」。這種「人間情懷」表現正是知識分子（尤以專業的人文學者）堅持從個人本位出發的基礎上，對人類、社會、政治和文化做出的關照。

由於很早便以人文學者為志，何國忠的「人間情懷」亦體現為對學術使命的自覺承擔。散文創作是他專業研究之外的另一種自我表達，旨在以「跳脫的筆法」^④傳遞學者的文化反思。這種「跳脫」並非疏離現實，而是以更自由的姿態介入人文議題。其校園散文很早就從人文精神角度去審視馬來西亞華社與文化的困境，如在《斑苔谷燈影》的〈人文鼓鐘〉（1995）一文中，作者從陳寅恪（1890-1969）和徐志摩（1897-1931）取向高遠的學術精神出發，他指出「我們的文化還在某一個層次裡滯留不前」，並呼籲「文化探討的工作不應該永遠停留在啟蒙或概論式的階

① 何國忠：〈只有一葉蟲蛀的桔黃〉，《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55。

② 何國忠：〈理性與感性之間〉，《塔裡塔外》，頁 38-45。

③ 何國忠：〈書事〉，《塔裡塔外》，頁 60-66。

④ 鄭明嫻：〈論何國忠散文〉，《香港文學》，2016 年 3 月，第 375 期。

段」^①。這種思考體現了他對文化發展前景的憂忡，與其胡適思想研究一脈相承，流露出深厚的人文關懷。這一思想底色不可否認地繼承自五四知識分子傳統。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如魯迅（1881-1936）、陳獨秀（1879-1942）等人，以批判傳統、救國救民為己任，憂患意識多集中於國家民族的命運。而何國忠長期從事思想史研究，他同時也受到 20 世紀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的影響，於是在散文創作中自覺地尋求生命意義和精神價值，流露其學者的「人間情懷」。

如前所述，何國忠最是重人重情，因此其散文大多寫人，而他又最重視人物的性情，他常通過人物性情去思考、探索和剖析文化和歷史，表現其對民族群體文化命運的深刻憂懷，流露對人的真摯關懷。胡適、周作人（1885-1967）、梁啟超（1873-1929）、王國維（1877-1927）等五四文人，余時英（1930-2021）、柳存仁（1917-2009）等當代文人，馬來西亞文化人族魂林連玉（1901-1985），其師長鄭良樹（1940-2016）、林水檠（1942-），還有時常與其交往的張景雲（1940-）、賴瑞和（1953-2022）、祝家華（1962-）、何啟良（1954-）等人皆反覆出現在散文中，可見都是時常徘徊在其心中的人物。其中，最能凸顯何國忠人間情懷的便是他以閒聊式隨筆所寫的「懷人散文」，尤其是三十篇寫馬來西亞及中外文化界人物的《文化人的感情世界》。

^① 何國忠：〈人文鼓鐘〉，《班荅谷燈影》，頁 168-170。

《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以中國及馬來西亞華裔文化人為主敘述對象，亦包含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等中馬以外的文化人。與一般人物傳記聚焦學術功業不同，此書所記所論偏於人物的性情、精神、趣味。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書寫九位傑出的馬來西亞華裔，足見何國忠對樹立華社風範之重視，鄭明娉認為他是在為所敬佩的馬華文化人立傳。書中對跨域文化人命運的書寫，既關注對林連玉、鄭良樹等馬華本土知識分子的文化堅守，也涵蓋對中西文化碰撞下人性矛盾的思辨。〈被遺忘的醫生〉（2002）、〈那個檳城人〉（2002）、〈終識父語〉（2002）分別敘述了伍連德（1879-1960）、辜鴻銘（1857-1928）和林文慶（1869-1957）三位晚清民初新馬出生，與中國有著特別淵源的讀書人。三位皆為留學英國的英校生，早年不諳中文。相較於捲入政治洪流的辜鴻銘和林文慶，出生於檳城的伍連德選擇置身事外，〈被遺忘的醫生〉文中寫道：「1954年東姑阿都拉曼和陳禎祿到怡保勸他從政，伍連德的拒絕理由極為有趣：『政治會太傷腦筋的』」^①。伍連德是醫生，憑著醫學救國的理念貫徹始終，對中國和馬來西亞的醫學界都有重要的貢獻，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稱：他的死對醫學界是一個莫大的損失，我們失去了一位傳奇性

^① 何國忠：〈被遺忘的醫生〉，《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125-130。

的英雄人物^①。〈被遺忘的醫生〉描述了伍連德的堅守醫學崗位卻淡泊政治，最後這樣寫道：「怡保和檳城雖然各有一條路以其命名，但許多人或者像我一樣，走過而不知道。」^②文章戛然而止，平淡卻餘味深長，既致敬伍連德的貢獻，又揭示其被遺忘的命運，蘊含對文化記憶消逝的深切憂思。辜鴻銘常被描繪為「怪」、「狂」與中華文化狂熱者，何國忠跳脫了對辜鴻銘的刻板印象，深入剖析其在中西文化衝突中的複雜性，他認為辜鴻銘「是一個富有浪漫氣息的人物，他性格偏激，文字犀利。五四時期反傳統主義盛行，辜鴻銘在中西文化的爭論中，被推到極端，成了一個只會高舉傳統旗幟的怪物。」^③他以理解而非批判的眼光，刻畫辜鴻銘的浪漫與偏激，揭示了對文化人精神困境的共情。在〈那個檳城人〉以辜鴻銘「偏激崇古」的性情，揭示文化認同的複雜性與矛盾性：

近代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讓人有錯位的感覺，五四時代反傳統的健將陳獨秀和吳虞，都沒有去過西方，但對中華文化卻有強烈的排斥，辜鴻銘精通西學卻又對中華文化懷著極端崇敬的態度。^④

通過辜鴻銘的「錯位」形象，何國忠揭示了近代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普遍困境。在〈終識父語〉中，探討了林文慶從不

^① 何國忠：〈被遺忘的醫生〉，《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25-130。

^② 何國忠：〈被遺忘的醫生〉，《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25-130。

^③ 何國忠：〈那個檳城人〉，《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31-136。

^④ 何國忠：〈那個檳城人〉，《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31-136。

諳中文到「降服中華文化」的心路歷程。作者對比林文慶與魯迅等人，指出：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都不能簡單地概括，魯迅反傳統，誰都知道他的國學根基是林文慶望塵莫及的，但就西方文化的領會，魯迅當然遠遠不及林文慶。這種現象有趣也好玩，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本來就充滿了矛盾，許多討厭中華文化的人，國學基礎深厚得可怕，魯迅和錢玄同都是例子，而擁護中華文化的人，又常常都是那些英文根底極強的人，林文慶以及「學衡」君子如梅光迪和吳宓都是。^①

這種「錯位」現象揭示了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中的矛盾與掙扎，而何國忠對矛盾的包容，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敘事，展現了對人性複雜性的深刻共情。辜鴻銘和林文慶都是因機遇「降服中華文化，破開零的侷限，苦學中文」^②，而伍連德則保持疏離。散文以平實敘述與含蓄情志，捕捉了這三位文化人在時代洪流中的精神世界，並通過他們的故事，反思文化傳承的複雜性，體現了對個體命運的深層關懷。這種不加評判、理解與共情的筆調，揭示了文化人精神世界的複雜性，超越了族群敘事的侷限。

《文化人的感情世界》裡所述的文人，大多帶有悲劇色彩。他們的悲劇人格和悲劇命運共同構成了何國忠對文化人宿命的終

^① 何國忠：〈終識父語〉，《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37-142。

^② 何國忠：〈終識父語〉，《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37-142。

極思考：他們的悲劇性並非個體的偶然，而是文明衝突中人文精神困境的縮影。作為學者型作家，何國忠的校園散文與其學術研究相輔相成。他在《文化人的感情世界·自序》云：「對一個文化人來說，對自身及群體的反省，是畢生事業中一部分無形的負擔……本書為作者最近之人物研究與人文觀察之凝聚。」^①《文化人的感情世界》的創作期間，何國忠正與林水檉、何啟良編撰著《承襲與抉擇：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人物》，因此得以深入理解馬來西亞的文化人物。他融史料、知識和思辨為一體，將學術知識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表達對人生際遇和歷史文化的理解與反思，並通過此書對跨域文化人命運的書寫，將個體苦悶昇華為對人類精神困境的共情。故何國忠不寫文化人的經國大業而聚焦感情世界，筆者以為並非如鍾怡雯所說的「無法改變現實，『反求諸己』的抵抗或回應」^②，而是通過「人」的微觀敘事，叩問文明存續的宏觀命題，以文化共情超越「感時憂國」的侷限。由此可見，「人間情懷」才是他更深重的憂患內涵，亦構成其散文終將走向文化超越的基石。

這分「人間情懷」更進一步表現在對人類文化發展前景的憂懷。除了自覺承擔歷史文化的反思，何國忠在其三部曲的部分篇章裡，也透過對自然、環境和人生價值的探討，折射對於人類命

^① 何國忠：〈自序〉，《文化人的感情世界》，無頁碼，位於封底摺口。

^② 鍾怡雯：〈「浪漫」傳統〉，《永夏之雨：馬華散文史研究》，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2017年，頁147。

運的深層關切。雖然涉及對生態問題或文明演進的篇幅不多，卻也顯現了其視野早已超越本土與族群邊界，進入了人類共同命運的宏大話題。在〈直觀心情〉（1995）中，他從知識分子視角談環保：

環境保護當然是一個大課題。我是門外漢，一切觀感都是從「看了開心」，「感覺舒服」角度出發，侷限在單純的直觀裡，不敢說莊嚴一面的理念。現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不能只顧自己，雖然不容易保存層次太高的文化品位，也不能太在意幽古情懷和文化藝術，那會使自己陷入死胡同；但總難免希望政府在美感和發展中注意一下兩全其美的方法。^①

城市的發展帶來生態問題，也對人文與文化空間帶來危機，何國忠不是環保分子，他沒有高談環保，而是以人文視角表達對城市發展能兼顧文化與美感的期望。文中也論及其所在的馬大因發展需要大肆砍伐樹木、破壞校園的自然景觀，導致曾作為「文藝男女靈感泉源」的馬大湖一度乾涸，校園失去原有的風情。這一場景的凋零，實為文化空間萎縮的縮影。於是他借題發揮，從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重構大學的人文圖景：

大學應該綠意盎然，並且每時每刻綠意盎然。有草原、有小澗、有山丘、有樹林、有湖泊，據說以前普林斯頓大學沒有湖，學生悶悶不樂，後來有一位校友捐了一筆

^① 何國忠：〈直觀心情〉，《塔裡塔外》，頁 53-59。

錢，挖了一個大湖，於是普林斯頓的學生也可以像哈佛、劍橋、耶魯、康奈爾一樣划船，大家才展露歡顏。那才像校園，校園應如陳之藩在《失根的蘭花》所提到「美的像首詩，也像幅畫，依山起伏，古樹成蔭」才是，如此人才會有幻想力，才能寫一些真真假假的妙文。像劍橋的徐志摩，海德堡的金耀基（1935-），還有中大的余光中（1928-2017）。^①

借「綠意盎然的大學」意象，作者將環保議題隱喻為人文精神的存續之憂，標誌著其憂患意識從族群命運向人類文明層面的拓展。

「人間情懷」最終指向了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追問。這一追問既是對存在本質的哲學思辨，亦是對知識分子精神使命的倫理回應。身為敏感而多情的知識分子，在〈年少紀事〉（1995）一文中，作者以近乎存在主義的筆觸袒露困惑：

我在尋找人生意義。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陽光底下無新鮮事，若人生真是舞台，我們在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已經被扮演幾千幾萬次了。但我們始終無法演得好。為什麼？我不斷思考人生的意義。……雖然覺得生命很無奈，也很空虛，但若有人要我放棄生命，又覺得不甘心，也許是真的習慣愛了，但

^① 何國忠：〈直觀心情〉，《塔裡塔外》，頁 53-59。

愛又是什麼？^①

此處的「舞台」隱喻，既呼應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人生如戲」的荒誕性，又暗合傳統文人對生命短暫與歷史循環的喟嘆。然而，他並未沉溺於虛無，而是以白先勇（1937-）《驀然回首》中「七情六慾煎熬的苦難」為啟示，頓悟「人的悲劇是必然的」^②。這種悲劇意識並不同於消極認命，而是以「悲天憫人的同情心」為支點，將個體彷徨昇華為對人類普遍困境的共情。在〈花開花落〉（2002），他也通過伍爾芙的悲劇，探討生命意義與精神自由的永恆困局，最後以「我們步步追尋她的死因，覺察到的卻是人生的無言以對」^③做結，冷峻筆調下暗湧著對精神困境的深切體察，這種「冷筆熱腸」的敘述策略，恰是學者理性與文人感性的交融：一方面以學術眼光剖析悲劇根源，另一方面以文學筆法守護人性的溫度，在節制中凸顯憂懷的深沉。何國忠分別在〈感性和理性之間〉（1995）和〈人間今夜渾如夢〉（2002）寫到王國維之死，他認為「王國維就是想得太過深沉，所以注意到許多別人觀察不到的事物，但也由於他的敏銳，結果許多事情讓他無以釋懷」^④。對於王國維「深思熟慮的自沉」^⑤，在〈人間今夜渾如夢〉他寫道：「就王國維的精神取

^① 何國忠：〈年少紀事〉，《塔裡塔外》，頁 67-84。

^② 何國忠：〈年少紀事〉，《塔裡塔外》，頁 67-84。

^③ 何國忠：〈花開花落〉，《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113-118。

^④ 何國忠：〈理性與感性之間〉，《塔裡塔外》，頁 38-45。

^⑤ 何國忠：〈理性與感性之間〉，《塔裡塔外》，頁 38-45。

向來說，我們只能尊重，若有人因他放棄人生而以愚笨稱之，我們只能說生命之事豈能一言道盡，誰敢狂妄地說比王國維想得更深微？」^① 這種對文化人精神選擇的尊重與共情，正是「先天下之憂」傳統在當代的延續：從范仲淹「憂其民」到何國忠「憂其人」，對人性價值的堅守始終未變，但關懷視野由家國延伸至全人類。如此對生命本質矛盾的剖析，既繼承了儒家「士人」的責任倫理，又結合現代對個體生存的反思，使得「憂患」不再侷限於族群命運或政治現實，而是觸及自由與限制、理想與幻滅、意義與虛無等多重張力。通過散文創作，何國忠將王國維的「文化託命」、伍爾芙的「精神自由」、白先勇的「悲憫之心」編織成一張跨越時空的意義之網，讓這種憂思在多重文化的交匯中綿延，迴響於對生命本質的深沉追問之中。

隨著寫作的不斷推進，「人間情懷」意涵超越了「感時憂國」傳統框架，散文的聚焦點從族群危機延伸至人類文明的終極關懷。身處人文專業之學者身分，何國忠通過文化共情與理性思考，將憂慮融入對人性、歷史與文明的省思，既延續了對華社前途的關注，又拓展至對更宏闊的普世價值的守護。從《班荅谷燈影》到《塔裡塔外》，再到《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作品視域的逐漸擴大，見證了作者從「大學生—社會觀察者」到「學術型散文家—理想堅守者」再到「人文學者—人間情懷守護者」的成長歷程。由此，他的關注焦點不再侷限於地域或當下，而是投向人

^① 何國忠：〈人間今夜渾如夢〉，《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61-66。

類文明的未來與可能。

「感時憂國」、「感物吟志」到「人間情懷」三重憂患維度，構成了何國忠思想的深層結構。他未停留於社會運動或族群抗爭的層面，而是在跨文化與學術視野中探尋長遠的精神支持與文化啟迪。鍾怡雯將之視為「反浪漫的浪漫」，雖有啟示性，卻未必全面。對何國忠而言，「淡定」與「情感」書寫更可能是拓展社會意義與人文價值的另一路徑：透過學術與散文的互文方式，將憂患傳統置於更廣闊的人類文明進程中加以詮釋與實踐，從而通往對終極關懷的超越與召喚。因此，何國忠的「人間情懷」並不意味著對社會改革的退卻或無奈，而是知識分子自覺超越族群、面向普遍人性的選擇。他在散文中逐步展現出既立足本土又胸懷世界的文化格局，也為「校園散文」中的憂患意識注入了更博大的內涵。這種從「社會」到「文化」，再到「人性」的跨越，呼應「先天下之憂」深厚的文人傳統，也彰顯了當代華裔知識分子理性思辨與人文情懷相互交融的寫作風采，使其作品在馬來西亞華文文學語境之外，也能折射深遠的人文意味。

三、敘述風格的理性克制：知識分子性格的文本投射

（一）不渲不染的憂患敘述

何國忠的憂患書寫始終是以理性克制為底色。在同時期校園散文中，他的筆調顯得格外冷靜，這樣的敘述風格恰是其知識分子性格中理性與克制的文本投射。潘碧華的〈八〇年代校園散文

所呈現的憂患意識〉（2004）將校園散文中的「憂患意識」概括為「憂慮、孤憤、沉痛、壓抑性的情緒」^①。何國忠的散文雖同樣流露出對華社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深沉憂慮，不過他將「感傷特質」拿捏得恰到好處，鮮有如溫任平或潘碧華所稱的「孤憤之情」。面對不公政策或堪憂處境，何國忠儘管心有沉痛幽憤，卻始終保持平實、冷靜的筆調。

他在《塔裡塔外·後記》中寫道：「我始終清楚，大歡和大痛都是人間微不足道的漣漪……在自己書寫的過程中，耳邊常會響起大文人、大學者的聲音，因此下筆用字多了一層猶豫」^②。這種「猶豫」並非怯懦，而是學者自覺與歷史縱深的體現：與其讓「歡痛」席捲理智，毋寧迴歸學術主體，透過對歷史與現實的縱深觀察，冷靜地表達對華社與人類命運的關懷。因此，他有意避免情緒化宣洩，轉而通過文化的內省與理性的剖析表達憂思，將深沉憂懷融入平淡自然的敘述中。

這樣的寫作格調是有跡可循的。他在〈萬里長風〉（1995）說胡適「下筆穩重，既不慘兮兮，也不飄飄然，唯文化良心和社會公道是問，替中國現代化提出許多到今天還值得深思的問題……胡適一向理智而冷靜。理智的人心都會細，事事都考慮到前因後果；冷靜的人眼睛都會敏銳，看事情自然比較清楚。」^③

^① 潘碧華：〈八〇年代校園散文所呈現的憂患意識〉，收入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編《赤道回聲》，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4年，頁292-304。

^② 何國忠：〈後記〉，《塔裡塔外》，頁191-193。

^③ 何國忠：〈萬里長風〉，《班荇谷燈影》，頁143-146。

他借胡適「理智而冷靜」的筆風，強調知識分子需以長遠眼光審視現實：「胡適沒有沉痛的悲哀，沒有狂熱的情緒。因為他的看的是長遠的中國。」^①其敘述策略也深受周作人的「沖淡」文風影響。在〈苦雨齋將不知是什麼樣兒了〉（2002），他評價周作人：「周作人的文章未嘗不罵世，未嘗不暴露黑暗，未嘗沒有一種微澀的苦味，但他寫的東西較多含蓄，在亂世和無端的社會中，一直都表現一種平淡、祥和和懇切的風采，關鍵所在，點撥兩下嚴肅的意見，悠然一見南山就止住，這也就是他文章耐看的緣故」^②。他顯然推崇這種「含蓄、平淡、祥和」的風格，並將其內化為自身寫作特質。故而，無論抒寫的主題、談論的課題多麼沉重，何國忠的散文始終保持平淡自然的行文，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感情基調，「不徐不急」的敘述節奏（陳大為語）^③，這大約就是他有意經營的寫作風格。

在《班荅谷燈影·後記》何國忠寫道：「我不太相信靈感。這本集子裡的文章，大體上都和閱讀、觀察、思索有關」^④。閱讀、觀察之所得，經過思索後，心中即使再憤慨，經作者用心經營後衍化而成的文字已不是宣洩似的傾訴或控訴，不再是情緒書

^① 何國忠：〈萬里長風〉，《班荅谷燈影》，頁 143-146。

^② 何國忠：〈苦雨齋將不知是什麼樣兒了〉，《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頁 83-88。

^③ 陳大為：〈校園散文的生產語境及其譜系之完成（1979-1994）〉，《馬華散文史縱論（1957-2007）》，頁 185-222。

^④ 何國忠：〈後記〉，《班荅谷燈影》，頁 174-178。

寫，而是化成了何國忠式「不渲不染」的憂患敘述。所謂「不渲不染」，並非一味抹平情感，而是將憂懷化為更深沉的理性審視，將現實壓力轉化為思辨張力，凸顯其作為知識分子的理性特質。

（二）傳統文人與現代學者的調和

貫穿於何國忠的散文之中的，除了「不渲不染」的憂患敘述策略，還有他自身「傳統文人」與「現代學者」雙重身分之間的動態調和。作為一位成長於 1980 年代馬來西亞的華裔知識分子，他既承繼了中華文化中「士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又在現代學術體制裡接受了理性思辨的訓練。這種雙重身分所帶來的張力，既影響了他的散文，也形塑出其獨特的知識分子人格。

作為「學院派散文」的代表，若溯及何國忠散文的內在精神源頭，則可發現他延續了古典文人的擔當意識。曾維龍以「從傳統思想文化之中尋找對應之道的傳統知識分子」^①評價之，而他自己亦以文人自詡。「先天下之憂」的價值取向一直是傳統文人最核心的精神信念，不僅代表著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關懷，也是一種道德自覺。何國忠青年時期在校內外組織華文學會等活動，屢屢表現出此種文人擔當；他在早期作品中如〈殘存記憶中的騰躍〉（1995）、〈時代的眼睛〉（1995）常聚焦對華社生存

^① 曾維龍：〈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的政論寫作〉，《批判與尋路：90 年代馬來西亞華社評論寫作》，雪蘭莪：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1 年，頁 45-72。

處境的關注。相較於單純的「爭取權益」，他傾向從文化理想與文明延續的角度來加以詮釋，這無疑展現了傳統文人對民族文化的深切情懷。然而，他未止步於「士大夫」式的激情。他在高等學府裡所接受的現代學術訓練，使他對社會、歷史與文學有了更為理性、批判的眼光。他在散文書寫中，時常通過文獻考據或跨文化比對等方式展開論述，如在談及伍連德、辜鴻銘以及馬來西亞華社境況時，常呈現出史料佐證與理論思辨的痕跡。這種學術底蘊使得他的散文不流於濫情或單一抒發，也推動其從「浪漫式」悲情走向冷靜、自覺的深層批判。例如，《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雖表面是懷人散文，卻借實地資料與歷史背景剖析這些文化人物在政治、社會與學術的交匯處所承擔的使命，賦予作品更多「學院派」深度。

鍾怡雯認為何國忠不書寫「經國大志」而偏向書寫情感世界，或許是「對社會改革無力的掩飾」^①。但若從傳統文人與現代學者的精神融合的視角切入，則可發現：這其實是何國忠基於學術立場與文人情懷的「迂迴介入」，並不意味對政治社會的妥協或失語。傳統文人常以曲筆述歷史興衰、社會時弊；現代學者亦可藉由研究成果與平實敘述來踐行文化使命。何國忠正是在其散文的書寫中糅合了兩者，把「家國憂思」轉化為更具理性與學理性的文化關照。看似淡定的文字，其實隱藏著的是深沉的批判

^① 鍾怡雯：〈「浪漫」傳統〉，《永夏之雨：馬華散文史研究》，頁 129-148。

和溫暖的人文關懷。他不選擇煽情或直接對抗，並非「無能為力」，而是知識分子對複雜現實的一種冷靜因應。與此同時，這種理性克制的敘述策略也使作品更具延續性：並非借一時激昂打動人心，而是在溫和沉潛之中彰顯了文人的宏闊視野。在面對族群困境與全球化挑戰之際，這種兼具「文人之心」與「學者之思」的創作風格，不斷呼應何國忠對華社前途與人類文化發展的憂忡。

散文中體現的「傳統文人與現代學者的調和」，正是何國忠的憂患意識在身分層面上的最佳寫照：既有對家國文化的深切情懷，也具備學術理性的敏銳分析；既延續文人「入世」的擔當精神，又在對改革思考中保有學者的冷靜與「出世」的氣質。正因如此，他的文字不侷限於單純「論政」或「訴苦」，而在一種更寬闊、更縱深的敘述空間裡，將深沉的憂懷融匯於其散文的語言美學與理性沉思之中。他的散文折射了華裔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時代與文化交錯處境，並在不喧譁的姿態裡，穩固而持續地推動著對華社、對學術、對人文精神的多重關懷。從這點上看，何國忠既是一個深受傳統文人影響的「士」，亦是融入現代學術訓練的「學者」，兩者並不互斥，而是在他的寫作與人生道路上不斷調和，最終呈現為其「學院派散文」的核心風格與精神內涵。

結語：先天下之憂的現代迴響

在大學時代出版校園散文集《班荳谷燈影》以後，何國忠便

被馬華文學界寄以厚望，被喻為「90 年代的星光」。他也不負眾望，以其帶有學者氣質的散文在 1980-1990 年代馬華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跡。他不僅以「校園三部曲」奠定了此一校園散文路向的基礎，更以深沉的「憂患意識」為精神內核，提升了這一體裁的思想高度與人文深度。關於 1980-1990 年代馬華校園散文的憂患內涵，學者與評論者普遍將焦點落在「感時憂國」或「感時憂族」^①，畢竟「華社憂患」是馬哈迪時代的抒情主調。然而，何國忠的校園寫作從 1980 年代持續至 21 世紀初，不僅貫穿了這一散文路向的開啟與成熟，其創作跨度之長、視野之廣，也遠遠超過一些早夭的校園寫手。隨著從青年學子到人文學者的身分轉變，他的「憂患心理」亦隨之演變，因而無法以單純的「感時憂國」來加以概括。由此可見，何國忠散文的獨特性，不在於單一的家國憂思書寫，而在於其憂患意識由現實關懷推進至個體省思與人間情懷，從而形成更具層次的人文精神結構。

作為早年立志，後來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何國忠的散文不若與其同時期的馬華學者作家如祝家華（1963-）的孤憤、辛吟松（1963-）的悲愴，其文章所展現的憂患內涵，也並不完全如部分研究者所說那般：因政治上的無力感而將「文化託命」付諸宣洩性文字。從《班荅谷燈影》到《塔裡塔外》，再到《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其書寫呈現出清晰的演進軌跡：從「感時憂國」的現實介入、「感物吟志」的個體省思，最終昇華為「人間情

^① 黃錦樹：〈在馬哈迪時代抒情〉，《馬華文學與文化讀本》，頁 133。

懷」的文化超越。這三重維度並非線性更替，而是如螺旋般交織共生，既延續了傳統的士人精神，又在當代華裔知識分子的實踐中開拓出新的思想疆域。何國忠散文的獨特魅力不僅在於其多維的內涵，還體現在其理性克制的敘述風格。這種「不渲不染」的筆調，既是傳統文人沉鬱情懷的繼承，又融入了現代學者的理性思辨。他避免情緒化宣洩，將深沉憂懷融入平實冷靜的敘述，使作品兼具思想深度與人文溫度。這種風格不僅是其知識分子性格的文本投射，也為這一散文路向注入了獨特的理性光輝，提升了其審美層次。

何國忠的「學院派散文」以深沉憂患為靈魂，以理性克制為形式，深刻體現了馬來西亞華裔知識分子的精神軌跡，見證了一個知識分子從時代觀察者到人文守護者的思想成長史。本文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對何國忠「家國憂思」的單一解讀，揭示其憂患意識從對族群命運的關注擴展至對人文精神的追求演進軌跡。通過對其思想歷程的歷時性重構，本文論證了何國忠如何在當代馬華語境下踐行「先天下之憂」：不僅關注華社現實，更在文化傳承與人性關懷中探尋終極價值。這種多維視角凸顯了他的學院派散文超越地域與族群界限的文化格局，成為馬華文學史的一道獨特風景，也為當代華文文學的學理性探索與人文精神實踐，提供了生動而深刻的範例。

參考文獻：

文集

- 何國忠：《班荇谷燈影》初版，吉隆坡：澤吟書坊，1989 年。
- 何國忠：《班荇谷燈影》十方版，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 年。
- 何國忠：《塔裡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 年。
- 何國忠：《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陽出版社，2002 年。

論文集

- 何國忠：《今我來思》，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3 年。
- 何國忠：《馬來西亞華人：身分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研出版社，2002 年。
-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 年。
- 張錦忠、黃錦樹、高嘉謙編：《馬華文學與文化讀本》，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22 年。
- 陳大為：《馬華散文史縱論（1957-2007）》，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9 年。
- 曾維龍：《批判與尋路：90 年代馬來西亞華社評論寫作》，雪蘭莪：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1 年。
- 劉 勰，《文心雕龍·明詩》，周振甫譯《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散文史讀本》vol.1-3，台北：萬卷樓出

版社，2007 年。

鍾怡雯：《永夏之雨：馬華散文史研究》，吉隆坡：馬來亞大學，2017 年。

鍾怡雯：《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9 年。

鍾怡雯：《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景》，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6 年。

期刊論文

陳 蝶：〈細雨狂飆含笑過——回顧與展望馬華散文七十年〉，見戴小華，柯金德編《馬華文學七十年的回顧與前瞻》，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1991 年。

陳平原：〈學者的人間情懷〉，《讀書》，1993 年，（05）。

董正宇：〈也說「學者散文」〉，《理論與創作》，2001 年，第 1 期。

潘碧華：〈八〇年代校園散文所呈現的憂患意識〉，見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赤道回聲》，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4 年。

鄭明嫻：〈論何國忠散文〉，《香港文學》，2016 年 3 月，第 375 期。